

## 「漢傳佛教」如何形成的私見（下）

曹仕邦

此說一出，將華夏僧俗對不同經本內容交互矛盾的疑慮掃除了；他們依此「晃然」於原來這些矛盾緣於釋尊在不同時期講說不同程度的佛法！於是大家安心於上述的矛盾現象。由此寺院中人也一直師徒一代傳一代地傳授「五時」之說，以迄於現今。這一理論，成了漢傳佛教堅信不移的傳統<sup>18</sup>，而這套華人自創的理論，也維繫了華人對佛法的信心。

前面說過，華夏僧尼發展出絕對素食的傳統，其實亦關乎「五時說法」對這一傳統推動<sup>19</sup>。

第六，在魏者以迄隋唐，中國沙門以高門大族中人作為主要的宣弘對象，前已言之。然而自唐代開始，高門大族日漸衰落，於是僧伽改為向一般普羅大眾弘法。普羅大眾不似高門大族的深受儒家教育，他們接受不了高深的佛門義理，也讀不懂行文深奧的漢譯佛經<sup>20</sup>。古代的華夏法師有鑑於此，於是有些人便將漢譯佛經的經文配上音樂拍節，再由自己以美妙雄量的歌喉，在法會

上對眾清唱，以期用優美莊嚴的歌聲來感動信眾，使他們對佛法生敬。此類清唱佛經的法師們被稱為「經師」<sup>21</sup>。

此外，另有一些法師則將佛經內容簡介，改寫成簡單易懂的故事對眾宣講，藉此弘揚佛理。此類講故事的法師們被稱為「唱導」<sup>22</sup>。

及至此土發展出來的禪宗<sup>23</sup>，在唐代日漸盛行，禪門中人提出「指月」之說。他們打個譬喻，說月亮尚留在地平線之下將昇未昇之際，只有目光銳利的人能察覺出，地平線上所透出的微光而伸出手指指給大家看。而佛理相當於尚在半隱半現的月光，而佛經不過指向那微光的手指；倘使一個人已知月亮將要上升的方向，便不需要那根手指的指引了。換言之，禪門中人在教大家不必讀佛經，只要能在禪師指導之下感悟佛門真理便夠了！

由於禪門中人認為不必研讀佛經，信徒只要循著禪

師的指導去參禪冥想<sup>24</sup>，去感悟，便能悟出真理而成道，於是在唐代開始，禪宗日漸風行。到了宋代以降，禪宗差點成了獨佔性的宗派，雖然禪宗的宣弘以暗示為主，而暗示方式很特別。例如有人問禪師一個問題，禪師或指指天，指指地，或打你一下，用肢體動作回應；或反問一句：「今天的米價多少錢一斤？」用答非所問的方式回應<sup>25</sup>，使問者自己去悟。這種回應固然有點高深莫測，但它的神祕感卻深深地迷住了普羅大眾以至士大夫階級的人！

再者，在禪宗出現之前，華夏寺院是遵守印度傳來的戒律的。然而戒律依印度的熱帶生活制訂，很不適合實行於居住北溫帶的中國出家人。及至唐代懷海禪師（七二〇～八一四）在所居洪州（今江西省南昌市一帶）百丈山自己的寺院中創始了一套「清規」之後，懷海跟他的徒眾便依這套日後稱為「百丈清規」的守則過生活。緣於這套守則依據中土生活習慣而創製，非常合適在華夏，於是宋以後的寺院，都採用它來管治僧尼和處理寺院行政<sup>26</sup>。

更有，前面說過中土沙門受儒家影響而對父母或師尊行孝，而禪門中人更對華人的家族觀念代入於本宗的行輩關係之中，從現存明末清初的禪宗人物的書信中，

出現了「祖禪師」、「孫禪師」、「叔禪師」和「侄禪師」的彼此稱謂<sup>27</sup>。

由是可見，漢傳佛教能推動而延綿迄今，禪宗之功不可沒。

以上是筆者對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和轉變，提出個人看法供大家參考，其掛一漏萬，在所難免，敬祈大家賜正！

至於上述那仁兄提到的「新文化運動」曾否發生過？筆者未經研究，也無興趣研究，今置之不論。不過，筆者卻知道中國化之後，曾對儒家引起重大的變革，這就是宋代以降「理學」的興起。

### 禪宗、新儒學與亞洲

「理學」就是如今稱為「新儒學」的一種學風，西人名之為neo-Confucianism。何以儒學有「新」與「舊」之別？因為兩者從事的治學重點大有不同。東漢班固（三二～九二）《漢書》<sup>28</sup>卷三十《藝文志》略云：

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，助人君，順陰陽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（頁六八五上）。

據此，則儒家原本所看重者，是如何依據六經而佐輔人君治國。雖然儒者有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口號，但仍著重於「治國」與「平天下」；不過認為欲達成此目的，應自「修身」做起而已。換言之，儒學本來並不強達「修身」之道，也就並不著重如何「做人」之道。

新儒學則不然，他們強調「心」與「性」的修養，強調如何「做人」的重要，「治國」與「平天下」似乎擺在一邊！

新儒學與傳統儒學的治學重點，其差異如此明顯，固此元代脫脫（一三一四～一三五五）主修的《宋史》不得不分別立「道學傳」與「儒林傳」來替兩派的儒者各自立傳<sup>29</sup>。

中國的儒家何以產生如斯重大的分歧？據中外學者們的研究，發現唐代以來的禪宗早已講「心」講「性」，而理學則自五代至北宋漸漸形成，由是推論出「新儒學」的產生，無疑受到禪宗學說的影響。這一發現，如今成了國際學界的公論<sup>30</sup>！而理學在中國成立之後，更影響了日、韓、越三鄰<sup>31</sup>。倘使漢傳佛教會真個掀起了亞洲的「新文化運動」的話，則新儒學的成立，可視為這一文化運動的重大成果！可惜，上述那位仁兄的演講

未見片言隻字涉及這方面，難道其孤陋寡聞，竟一至於此？  
(全文完)

註：

18. 其實「五時說法」是華夏僧從一廂情願的理想，跟佛教在印度的真實發展史可謂南轅北轍。雖然如今佛學研究發達，教義和教史了解日深，但猶有大部份佛教徒對此絕不起疑心。

19. 參拙作〈論推動華夏僧尼發展蔬食傳統的兩大歷史因緣〉頁三七，刊於《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》第十四期，台南，民九十九年。

20. 漢譯佛經何以文字深奧？往往不通訓詁學讀不懂？請參拙作〈談漢譯佛經的譯文何以深奧難懂？——兼言古時佛家對普羅大眾的弘法方式〉全文，刊於《護僧》第五十七期，高雄，二〇〇九。

21. 同前註，又參拙作《史學史》頁九三～九四。

22. 同前註。

23. 禪宗與天台宗都是中國僧徒自己創始的宗派，雖然前者稱本宗有西天二十八祖；後者也申言來華前在天竺已有二十四祖，實則兩宗都是在華夏成立之後，分別牽引相同的教門先聖作為本宗的遠祖而已。參拙作

- 〈論釋門正統對紀律體裁的運用〉頁一五三，又頁一七五的註十一、註十二和註十三。刊於《新亞學報》十一卷上冊，香港，一九七四。
24. 「禪」這個字，梵文稱Dhyana，義為「Thinking（思索）」。
25. 在印度，僧徒以肢體動作為暗示是容許的；但答非所問則非傳統的宣弘方式，而認為應正面答覆對方的疑問。參拙作〈談華夏禪宗以暗示作弘法方式是否印度亦有？〉刊於本刊九十卷第七期，台北，二〇〇九。
26. 懷海禪師所創原始「清規」很簡單，稱為百丈規繩，今附見於《景德傳燈錄》中懷海的傳記之內。由於在唐朝以來華夏寺院採用時不斷增添規條，故有不少修訂本，如今流傳下來的有南宋的《禪苑清規》，元朝的《禪林備用清規》、《叢林校定清規總要》、《行住菴清規》等。至於成為今日定本的《敕修百丈清規》，則在元朝末年形成。清規實行之後，連律宗的寺院也加採用，而有《律苑事規》一書的修成。
27. 參陳垣先生（一八八〇～一九七一）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（科學出版社出版，北京，一九五九）頁五十，又頁六十至六十四。
28. 藝文映印武英殿刊本，台北，約民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之間出版。
29. 《宋史》卷四二七至四三八是（道學傳），內中為立傳者有程頤、張載、邵雍、朱熹等著多理學家；同書卷四三一～四三八是（儒林傳），內中替呂祖謙、陸九淵、鄭樵、王應麟等研治傳統儒學的人立傳。
30. 自陳觀勝（Kenneth Chien）先生於Buddhism in China—A Historical Survey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Princeton, New Jersey, 1964) 第十八章的引書目（在頁五四六至五四七）所開列的專書與論文的目錄，可見一斑。
31. 日本學者對新學研究的成績，請參前註。韓國情況如何？筆者未加探討。但以中韓兩國關係密切，韓國學人應有研究理學的人。而越南，則筆者敢肯定有人從事於此。何以言之？因為越南曾被中國的明朝統治了前後七年（一四一三～一四一九），而明成祖（一四〇三～一四二四在位）於永樂十七年（一四一九）將《性理大全》、《孝順事實》等關乎理學如何做人的典籍頒賜給越南的「府、州、縣儒學」（參拙作〈李、陳、黎三朝的越南佛教與政治〉頁四〇一～四〇二。刊於《新亞學報》十卷一期下，香港，一九七三），成祖硬要他們讀這類的書。